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

SHANG HAI DE
ZAO CHEN
ZHou er fu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

Ix47.5

227

121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SHANG HAI DE
ZAO CHEN

ZHou er fu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共分 2 部。它写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从斗争中不断壮大起来的面貌。小说用这一主线辐射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

主编
冯 牧
缪俊杰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53.625 印张 170.0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60.00 元

ISBN 7-80611-279-0/I·269

(全两册)



周而复

上卷 第二部

周而复

十

老王已经书好了一千多页，可是也
写得那么慢，连稿纸都在桌上流汗，而且
还不时地问：「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老王，你在写什么？」

周而复手迹



● 序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

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303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

许多作品还直接地正面地描写了某种政治运动,描写了政治运动中的斗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总结历史经验,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调整看法,对某些事件和过程实际上有了新的结论。这就使人们不仅开始重新审视历史,而且重新审视反映这些历史事件的文艺作品,对它的历史真实性和审美价值作出新的判断。因此,我们今天重印的这些作品很可能会涉及到对它们的历史评价问题。由于人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对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对某些文艺作品进行重新估价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足畏惧。问题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态度。记得有位西方历史学家这样说过: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他的唯一任务就是按照所发生过的事情的原样来叙述事情,他也许会形成某种个人的厌恶,但是他将把公众的利益看得更为重要并把真理置于他憎恶之上;他可以有特别喜爱的人物,但他不会宽恕他们的错误。历史就是历史。他唯一的准则与正确的向导是——不考虑他目前的听众而考虑将来查他说过的话的人。我们觉得这位西方历史学家说的是大实话也是真理。那就是研究历史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公众的利益看得最重要,而且要接受历史的检验。

我们认为,对待我们新中国的文学的评价也应该如此。我国的新文学(主要是指在人类先进世界现指引和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艰辛的历程。建国以来大家约定俗成地把它称为当代文学事业,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走过了四十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不论是七十年还是四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即被称为新文学或进步文学,其后又被称为人民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个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洞察能力和对于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为正在饥渴于精神食粮的中国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既鲜明又复杂、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驳杂的文学成果。这些成果,不论你怎样评价,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这些文学现象,七十多年来或四十多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于亿万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以及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这些作品及其作者,随着中国历史和人民解放与建设事业的急剧发展,日益明确和自觉地展现了以往的文学所不具备的特质,即把自己的生活观照和创作实践,同亿万人民所进行的宏伟壮丽而又艰巨纷繁的解放与变革事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长河中的脉搏相通、步伐一致的

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特别是长篇小说，真正成了时代的镜子。我们应该为我国新文学、特别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所逐渐取得的这种重要历史地位而自豪，而不应当像某些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不愿意把文学现象放在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虑，而总是热衷于某种外国的创作规范为标准，习惯于盲目的自薄乃至自卑的、近于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生长于祖国深厚民族土壤之上的文学现象。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要我们的文艺批评和审美目光没有任何发展和变化，而只是想强调：我们应该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出发，用历史的和美学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我们已经出现的并且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思想影响的文学现象，把它们置于一定的历史地位上加以审视和观照，进而考察和剖析它们在思想、艺术上的得失、美丑、高下和精粗，以此沟通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上获得教益。而不应当以偏执、轻率的态度，妄自菲薄乃至厚诬一切民族传统的态度，来对待前人辛勤耕耘所取得的精神成果。这些精神成果，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不管其中还存在有多少值得扬弃的缺陷和值得记取的教训，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积累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不断站在新的思想高度来回顾与总结历史，重新订正我们对新文学的看法和评价，而不应该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否定我国文学的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

在对我国新文学的种种议论中有一种说法：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是某个“政治运动”的直接成果。我们认为对这种看法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不能否定，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而能够被称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人，有时也难于幸免，从而出现过根据某些政治运动或僵化理论的影响而不断修改“旧作”的现象。但是也应看到，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能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维空间。产生于社会多维空间中的某种文学现象，它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政治冲击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社会多种力量的制约，这里面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的制约，也有上层建筑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道德以及社会心理、审美感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同一“政治气候”下，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素质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共和国成立前后，我们这批作家，他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深入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或火热斗争的现场，他们对变革中的社会生活有深刻的体验。他们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在广阔的生活层面

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正面地纪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就与某些浅薄的、仅仅去“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简单化作品不同。这些作家们以生活参与者的身份所获得的素材,并通过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艺术高度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从生活土壤中诞生出来的艺术,是十分难能可贵,也是今后文学发展中的新创作所无法取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像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所作的判断那样,是“不可企及的典范”。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那些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我国革命历史、甚至是某些政治斗争的作品都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正像我们不能把反映法国大革命的一些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等,看作是“政治口号的传声筒”一样。道理是十分明显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作品缺乏内在的审美力度,仅仅是反映生活的“镜子”而已。关于“文学是镜子”的说法历来就有争议。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就提出过诘难。他说:“倘使这面镜子是平常的镜子,有个光滑而平顺的表面,它把各种物件只能照出一种无光泽与凹凸、忠实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颜色与光线在单纯的反映中是会如何地失真。所以艺术必须是一面浓缩的镜子,它不会把有色的光线显淡,它把它们收缩凝结起来,使一种微光化作光明,一种光明化成火焰。”(雨果:《〈克林威尔〉序言》)雨果对“镜子说”提出的修正和补充是十分精辟的见解。他不反对说文学艺术是镜子,而说这不是普通平滑的镜子,而必须是能够把有色彩的光线收缩凝结起来的一种“聚光镜”。我们不敢说,这些被花山文艺出版社选入“丛书”系列的作品,在艺术上都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从后人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趣味来看,也许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从思想到艺术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塑造了许许多多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典型不仅有着栩栩如生鲜活的性格,而且像聚光镜一样,集中概括了较为深广的历史容量和社会特点,从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艺术典型,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检验,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我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画廊。这使我国传统文学中的人物群像中,又增加了一批具有进取意识、解放意识和奋力向上的工农兵劳动者人物“家族”。我们的文学不管如何发展,如何观念更新,这个崭新的人物家族,也是以后的文学所不可替代的。我们从这些人物的活动历史和心路历程中,不仅可以看到变革时代的潮汐,同时也能听见历史车轮的回声。这也许正

是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

我们把这批长篇小说当作我国新文学的宝贵财富，还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特色上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素养和艺术追求，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后来这些作家便成了我国一些文学流派领袖群伦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总是以某一时期具有独创性的一个或一批杰出作家为代表的。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西昆体、元和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新中国文学中的大作家，后来成了各种流派如什么“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湖湘派”、“岭南派”等的师表，对一代又一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的文学发展到今天枝叶繁茂、五彩纷呈，与新中国文学的这些前辈作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此，我们想到目前仍然面临的如何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的问题。正确对待和继承人类几千年来所创造的那些文化艺术珍品，不断地用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我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珍品，来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我们作家的艺术思维能力，提高他们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的能力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解放思想，不要排斥那些有益于我们事业的一切外国的好的东西。过去有过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作法。但就目前来讲，倒有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排斥西方好的东西，却排斥和轻视中国的好传统。他们也讲学习遗产，但却只热衷于阴阳八卦之类，甚至迷信那一套，而排斥本民族的珍品，他们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民族珍品反而看成糟粕。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地从自己的先人所创造的许多艺术经验中吸收宝贵的营养。一个时期以来，在某些作家、艺术家中，出现了某种“非民族化”的倾向，片面强调“走向世界”，一味寄希望于对于外国现代流派的模拟和学习上。如果仅仅模仿西方某些过时的以至没落的形式和手法，就是模仿得如何逼真，终究不能代替我们民族的创造。我们寄希望于那些进行严肃探索、既重视生活又重视传统的作家，只有他们的探索才有可能创作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意义，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秀作品，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事物总有它的两面。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优秀长篇小说，具有丰厚的社会内涵，在艺术上也显露出这些杰出作家的才华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当时文学创作发展的最高水平。但是，由于

受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左”倾思潮的发展和泛滥，文艺思想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论上对创作的干涉愈来愈多，这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那个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某些杰出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期的烟痕。我们的文学创作受到种种干扰，有时不得不从概念出发去设置某些人物的命运，甚至修改自己的创作构思，不能不把原作中本来是很精彩的章节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删节和修改。这就使不少作家产生了艺术上的遗憾。应该说，这不是作家本人的过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而这种时代的局限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克服和完善。

历史发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纪元。伴随着政治上清算“左”倾路线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开始走上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文学创作上出现了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进一步使现实主义深化的创作潮流。这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至少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强调文学向生活靠近，打破文化专制时期那种“瞒和骗”的文艺模式，恢复文艺“写真实”的功能，主张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发挥文艺“干预生活”的积极作用；第二，强调文艺靠近人民。主张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表达人民的呼声，发挥文艺对人民的教育功能。在“现实主义深化”的旗帜下，集合了一大批有创作实力的作家。这里面有继续坚持创作的老一辈作家和成名较早、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中年作家，也有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年轻一辈作家，他们文思泉涌，喷发出一股强大的创作热情，他们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有着敏锐的观察和发现，并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矛盾，着意刻画出处在生活激流漩涡中的英雄人物和勇敢斗士，或者描写出在新生活面前具有披荆斩棘精神的开拓者形象，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增添了新的特质和新的果实。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门的进一步洞开，我国文学很快出现了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向。在现实主义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问题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发展阶段以后，许多作家开始了借鉴西方艺术表现方法的尝试，他们把“意识流”、“象征”、“写意”、“抽象”、“隐喻”等等现代主义的手法，借鉴到我们的文学中来，形成了我国文学开放的格局。许多作家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再往前一步，有些“先锋”作家更直接把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思潮引进到我们的文艺领域。不管这些探索是成功或不成功，都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出现了新的活力。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作家，在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的基础上，

采用一些新的手法，创作出了相当数量具有厚重历史感，呈现出灿烂的思想光彩和艺术光彩的优秀作品，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宝库更加富足和充实。他们的新的创造同我国老一代作家的传统便构成了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我国形成了一条源源不断的文学长河。

我们这次选入“丛书”的作品，是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现的众多优秀的甚至堪称为“经典”的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老一辈作家的作品；在老一辈作家中也只选了一部分作家的作品。这虽然不是评奖，不会产生孰优孰劣之类的误解。但毕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选了这一部分而另外还有一些甚至比纳入“丛书”中的某些作品更有特色的作品又没有入选呢？这自有选编者和出版者的苦衷。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版权方面的原因。在考虑选目的时候，选编者和出版者也曾考虑过这一部或那一部作品应该纳入其中，但由于版权方面的协商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只好作罢。再就由于出版这套丛书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在数量上不能不有所限制，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遗珠之憾。除了期望取得某种谅解之外，只有寄希望于另一次出版机会，有更完满的结果。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部长篇小说最早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社出版的，现承蒙他们慨允一次性版权转让，才得以纳入本丛书，重新与读者见面。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五年三月于北京



时代的潮汐与历史的回声

——“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总序

马 牧 缪俊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国人民将隆重纪念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为了配合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激励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检阅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历史性成就，花山文艺出版社将重新出版一批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包括反映抗日战争）、经过较长时间考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杰出的长篇小说，定名为“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我们对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重大举措表示祝贺和敬意。

优秀的文学作品有时被称为反映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马克思说过：“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恩格斯也说过，巴

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因此，集中地重印一些具有丰厚社会内涵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文艺作品，让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回顾历史，认识社会，思考未来，同时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花山文艺出版社这次出版的都是反映我国人民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也就是说，都是反映二十世纪我国社会变革历程的作品。二十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辉煌灿烂而又曲折多变的历史纪元。这一个世纪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难以磨灭、值得永远回忆的一段历程。从十九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到二十世纪初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人民革命的蓬勃兴起；从三十年代法西斯势力的集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曲折前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和旷日持久的“冷战”，到各国之间对话的开始和矛盾的缓解，直到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整整一个世纪，真是“天翻地覆”，“旋转乾坤”。但是，无论历史发展如何曲折，或者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好，历史都将顺应时代的潮流，沿着社会繁荣、人类进步的方向前进，那些已经过去的历史和难忘的岁月，都将永远写在人类发展进程的史册上。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无论是辉煌还是暗淡，都值得我们的历史学家去记录，值得我们的文学家们去描绘。一个作家如果他是历史地、真实地、艺术地记录了这段历史，那么他的作品就会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对后人也会有教育启迪意义。这样的作品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花山文艺出版社这次重印的长篇小说，从题材来说，涉及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和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有反映中国大革命时期生活的，有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有反映中国解放战争的，有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有反映资产阶级工商业改造的，有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从作品的主人公来说，有写工农兵的，也有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还有写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

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303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二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

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